

出版社 教育

中国书法史

永和九年歲在癸卯暮春之初

癸卯年三月廿二日

暮春之初

癸卯年三月廿二日

暮春之初

癸卯年三月廿二日

暮春之初

秦代
南北朝
先秦两汉晋唐宋元清

卷

刘涛著

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
有崇山峻岭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

J292

L686

永和九年歲在癸

丁會稽山陰之

中國書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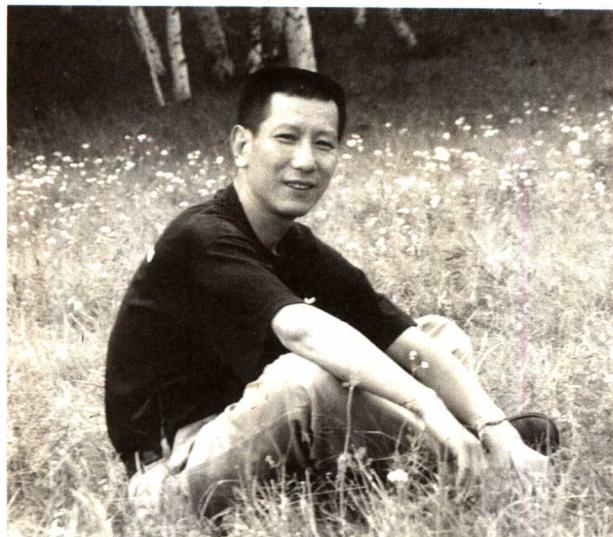
魏晉南北朝卷

江蘇教育出版社

721409

书名 中国书法史·魏晋南北朝卷
作者 刘涛
责任编辑 胡新群 徐金平
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
地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(邮编 210009)
网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经销商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排 南京印刷制版厂
印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厂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(邮编 210037)
电话 025-5521756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8
印张 38.5
插页 8
字数 473 000 千字
版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
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6 200 册
书号 ISBN 7-5343-3710-0/G · 3395
定价 47.90 元
邮购电话 025-5400774, 8008289797
批发电话 025-3249327, 3249091
盗版举报电话 025-3204538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邮购免收邮费，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

刘 涛 笔名阿涛、丛林、晴川涛等。1953年3月生于湖北武汉市，汉族。自幼习字，得祖父启蒙督课。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，留校任教。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。发表书法史学论文三十余篇，著有《书法谈丛》《中国书法全集·王羲之王献之卷》《汉字的艺术》(合著)等。

目 录

概 述 / 1

第一章 魏国书法 / 13

 第一节 洛下新风 / 14

 第二节 篆书和隶书 / 18

 第三节 中州书法家 / 34

第二章 吴国书法 / 43

 第一节 吴国的书风与书家 / 45

 第二节 吴国篆书 / 49

 第三节 吴国隶书 / 55

 第四节 吴国的楷书、行书和草书 / 62

第三章 锺、卫书法 / 71

 第一节 锺繇书法 / 71

 第二节 卫氏书学 / 82

 第三节 锺、卫书法的比较 / 92

第四章 西晋书法与书家 / 99

- 第一节 篆书 / 101
- 第二节 隶书 / 104
- 第三节 草书 / 109
- 第四节 行书 / 122
- 第五节 楷书 / 128
- 第六节 西晋书家与书风 / 140

第五章 东晋书法世家及书风的演变 / 153

- 第一节 东晋书法世家 / 154
- 第二节 东晋书风的演变 / 170

第六章 王羲之书法 / 179

- 第一节 生平事迹 / 179
- 第二节 书法师承 / 188
- 第三节 王羲之的书艺 / 191
- 第四节 王羲之的“今体”成就 / 205

第七章 王献之书法 / 213

- 第一节 生平事迹 / 213
- 第二节 王献之的书艺 / 217

第八章 东晋铭刻书迹 / 239

- 第一节 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类型 / 240
- 第二节 由家族墓志看东晋隶书的“分化”与“类化” / 247
- 第三节 东晋铭刻书迹中存在的“变态现象” / 250
- 第四节 东晋“方笔隶书”的流变与渊源 / 253
- 第五节 由“北碑”和“南帖”看东晋的铭刻书迹 / 255

目 录

第九章 南朝书法 / 261

- 第一节 主流书风——从王献之到王羲之 / 262
- 第二节 南朝书家擅长的书体 / 265
- 第三节 南朝的杂体书法 / 271
- 第四节 南朝帝王重视书法 / 279
- 第五节 南朝寒门书家与士族书家 / 284
- 第六节 南朝书迹述略 / 291

第十章 两晋南朝书论 / 309

- 第一节 西晋书论著作 / 311
- 第二节 东晋书论著作 / 314
- 第三节 南朝书论著作 / 320
- 第四节 书论著作的分类 / 337
- 第五节 书学概念 / 351

第十一章 十六国时期书法 / 365

- 第一节 十六国书迹概述 / 367
- 第二节 十六国时期的隶书 / 370
- 第三节 十六国时期的楷书墨迹 / 375
- 第四节 十六国时期的行书墨迹 / 384
- 第五节 十六国时期的书家与书风 / 389

第十二章 北魏书法、书家及书风的演变 / 399

- 第一节 北魏的“汉化”与文字及书法 / 401
- 第二节 北魏书门——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 / 415
- 第三节 平城时期 / 418
- 第四节 洛阳时期 / 432
- 第五节 北魏后期的书法家及“草隶”的流行 / 445

-
- 第十三章 北朝后期书法 / 451
- 第一节 东魏、西魏时期的书风变化 / 452
 - 第二节 北齐时期的书法 / 460
 - 第三节 “王褒入关”之后的北周书法 / 482
 - 第四节 南北书法进程的分合 / 489
- 第十四章 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 / 495
- 第一节 “碑”之由来 / 496
 - 第二节 东汉厚葬及立碑的风尚 / 497
 - 第三节 曹操禁碑 / 501
 - 第四节 魏晋时期 / 503
 - 第五节 南朝时期 / 508
 - 第六节 东晋南朝的僧侶立碑 / 513
 - 第七节 碑禁的结束 / 515
- 第十五章 东晋南朝的法书收藏与鉴定 / 521
- 第一节 东晋时期法书名迹的收藏 / 523
 - 第二节 宋、齐时期法书名迹的收藏 / 525
 - 第三节 梁、陈时期法书名迹的收藏 / 528
 - 第四节 北朝的名迹收藏 / 532
 - 第五节 东晋南朝时期的“装书”整理
与“押署”之制 / 533
 - 第六节 南朝御府藏品的鉴定与赝品 / 535
- 附 录 / 541
- 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大事年表 / 541
 - 西魏铭刻书迹统计表 / 593

目 录

- 磁县出土北齐碑志统计表 / 595
安阳地区出土北齐碑志统计表 / 596
南北书风演进对比表 / 597
唐朝代宗大历年间所存汉魏两晋南朝书迹简表 / 598
主要参考文献 / 604

概 述

公元 2 世纪末叶，东汉王朝先后经历了两次大动乱——体制之外的“黄巾起义”和体制之内的“董卓之乱”，东京、西京地区遭到极大的破坏，所谓“名都空而不居，百里绝而无君”。接续而来的是大小军阀自为方伯，各路豪杰称雄一方，“名教”政治业已崩溃，统一格局不复存在。公元 220 年，曹丕建国称帝，刘备、孙权相继效仿，形成魏、蜀、吴“三分天下”的局面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——魏晋南北朝时期。

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，一直徘徊着分裂的幽灵。不管是“魏晋”还是“南北朝”，政治格局都存在“空间”的“南北”对立。此一时期分裂的复杂性，不但因为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和政权分立，还有民族因素的介入，先后出现的数十个政权中，有十几个国家是匈奴、氐、羯、羌、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。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在北方活动，北方的政治局面更是错综纷杂，西晋永嘉之乱后，先有“十六国”的

争逐，后有东魏、西魏和北齐、北周的“东西”对峙。所以，典型的南北对峙局面，是前秦、北魏、北周统一北方时期。北周统一北方四年后的隋朝取代北周。公元589年，隋朝南下灭陈朝，终于结束了这段漫长的分裂局面。

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，学术文艺方面的变异和成就足以表明这一转型的深刻意义。在政治分裂、政权频繁更迭的场景中，政治的约束力相对松弛，为学术思想的活跃留出了空间；经常性的社会动荡又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，促进了人性的觉醒，激活了人们的思考力。

我们看到，魏晋名士的生活态度和处世作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他们饮酒任诞，服食炼丹，宽衣博带，扪虱而谈，粉饰容貌，夸豪斗富，简傲争胜，行为方式显得异常怪诞，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中留下了全面的记录^①。

我们看到，魏晋名士在学术面貌或者说学风上与东汉名士已经大为不同。“玄学”思潮在洛下兴盛起来，学风为之一新。从开创新学风的“正始名士”，到“竹林名士”的七贤，以至“中朝名士”的八子，他们不再像东汉名士那样专宗儒学经术，而是“儒玄兼综，礼玄双修”。他们大谈“自然”，争论“贵无”“崇有”，辩论“言意”和“才性”，对人生、社会、宇宙作出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和理性阐释，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了精彩斑斓的一章。

我们看到，对人生最为敏感的文学更是异彩纷呈。魏晋的名士和文士对人生表示出高度的敏感，从贵为君王的“三曹”到享有美誉的嵇康、阮籍，以及其他诗人，在他们的咏叹中，生命苦短的无奈，人生易老的感慨，生离死别的哀伤，功业难建的苦闷，欢乐即逝的喟叹，及时行乐的追求，比比皆是。王羲之生活在偏安江左的东晋，在记叙行乐的《兰亭序》中，也不免流露出悲观的情怀。文学表达的主题突显了人生、人性，文学体裁突破了旧有的范式。不独于此，专门的论文著作也出现了。据此，后代学者认为，自魏晋开始，文学已经进入“自觉的时代”^②。魏晋的

文士也敏锐地注意到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价值，正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所说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”，“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”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作为文字书写艺技的“书法”^③得到了高度的重视，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观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，以魏晋最为辉煌。但是，魏晋与东汉的书风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。我们知道，魏晋大为流行的新书体——草书、行书、楷书，莫不肇端于东汉。被奉为“草圣”的张芝，“行书之祖”的刘德昇，都是东汉人士。“正书之祖”的钟繇，虽然由汉臣而魏相，而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东汉，他的《贺捷表》即写于东汉。可以说，新书体是东汉书家留给魏晋书家的一份宝贵“遗产”；而曹魏、西晋书家无不学东汉书家的传人^④。传为东汉赵壹《非草书》一文中，西州名士“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、颜”的风气，则是东汉草书繁荣的记录。但是，《非草书》的作者对草书的盛行持批评的态度，表明重字法、轻艺能的正统观念还有相当的势力。

此一时期的文字遗迹，经过千余年风风雨雨，经过无数次兵燹战火，大多毁灭——韦诞题在宫观上的榜书，周顥题在文惠太子玄圃茅斋壁上的散隶，庾元威写在屏风上的二十四种杂体篆，此类书迹，都看不到了。就是易于收藏保存的王羲之尺牍，一件真迹也见不到了。但是，万劫之余的遗迹依然可观，我们在士族的尺牍中，在寺庙的经卷里，在边关的账簿里，在各地的碑志上，在石窟的佛像旁，在高高的山崖上，在残破的砖瓦边，还留下了各种书体的遗迹，成为我们窥探当时书法、书风的窗口。

魏晋时代，新书体的地位，人们的书法观念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变化之一：新体的草、行、楷书为士族阶层所接受，成为士流私人间

书写交流的时调^⑤，这是魏晋新书风形成的重要标志。西晋时，精通字学、传古法的卫氏也将草书列为书法的“四体”之一。

变化之二：汉朝课吏制度以“秦书八体”与“新莽六书”为规范，即所谓的“八体六书”，后起的三种新书体不在课吏之列，正如《非草书》所云：“乡邑不以此较能，朝廷不以此课吏，博士不以此讲试，四科不以此求备，征聘不问此意，考绩不课此字。”西晋时，秘书监立博士，置弟子教习行书，楷书也成为“传秘书，教小学”的书体^⑥。行书、楷书列入课吏的书法系统中，这也是推动新书风普及的重要因素。

变化之三：两晋时期，新书体具有了合法的地位，而且楷书成为了正体。

变化之四：新书风的流行也影响了“铭石书”。我们知道，自春秋战国以来，“铭石书”有一个由篆而隶，由隶而楷的演变过程。由篆而隶的转变在汉朝，由隶而楷的转变则是在南朝前期完成。西晋时，碑志仍然是隶书的领地，东晋墓志开始出现楷书。南朝刘宋墓志已经多是楷书，有的十分接近手写体。公元6世纪前期，南北的碑志都普遍采用楷书，梁朝的碑额也作楷书。

变化之五：人们也在书写实践中改造、完善新书体的样式，建立新书体的技法规范，而新书体的“今体”体势已经完全是抽象的“符号”，书写方法与古体大不一样，因此，以篆书为基础的字学理念不再是书法的惟一科律。当时纸张已经广泛使用，在纸上书写新体不仅能感受到书体本身带来的简便、自由，还能体验到笔作用于纸所产生的不同于在竹帛简上作书的新感觉。这些新的书法感受、新书体的简便特点，与士流借助书写显示个人的风度交融起来，从而形成了注重艺能表现的书写观念。

新书风—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书风，也有一个“南北”的话题，其发展壮大的演进过程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。

一、新书风的形成阶段（北方）——曹魏、西晋时期。新书风肇始于汉魏之际，渐盛于西晋。此一阶段，新书风的中心在中原的洛阳、颍川一

带。西晋时，人们日常书写的体势是楷、行、草书，宫殿的门榜、公私碑志则沿用旧体的篆、隶，新书风的势力已经足以匹敌旧书风。这一阶段是新书风的形成阶段，也是新体、旧体并存共荣的时代。

当时南方东吴的书家都擅长旧体，张纮甚至常用篆书写信，东吴书风基本上是东汉的书风延续，比较保守。西晋灭吴以后，洛阳新书风才渐及江南，但是也受到一些吴士的抵制。

二、新书风的变革与发展阶段（南方）——东晋时期。“永嘉之乱”以后，司马氏南迁江左，大批中原士族、名士带着新兴的文化风尚南下，新书风的中心遂由洛阳转移到江南的建康一带。东晋初年的书风承袭西晋，新体书法还带有隶书的遗意，大有变制翻新的余地。东晋第二、三代书家完成了这一变革，将新体书法推向了“今体”阶段，其代表人物是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。这一阶段，新体书法掩压旧体，居于主导地位，成为书风的主流。此时，北方书风仍然延续西晋的风尚，南北书风形成了“今妍”与“古质”的分野。

三、新书风北传阶段（南方到北方）——南北朝时期。南朝书风一直是传承东晋“二王”今体书法，而北方一度是传卫派古法的清河崔氏据于书坛的主导地位。公元5世纪以来，因了各种机缘，南朝书法得以北传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，南朝书风终于因了北魏“汉化”的契机由隐而彰，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，南土携来的书风具有了指导的地位，北方与南方书法形成了师承关系，北朝出现了效慕南朝新书风的第一个高潮，南北书风的差距大大缩小。西魏末年，梁朝书家王褒入关之后，备受礼遇，“贵遊等翕然并学褒书”，这是北朝效慕南朝书风的第二个高潮^⑦。

隋文帝取代北周八年后的公元589年，隋朝灭陈，结束了长达三百七十年的南北分裂局面，此时江南书法名家如欧阳询、虞世南都北迁仕隋，新书风的中心遂由江南北移到长安。虽然建康具有的政治、文化中心的地位随之消失，但是南朝书法成为全国的主流书风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伴随新书体的盛行，古体的篆书、隶书由盛转衰。

曹魏、东吴、西晋时期，人们崇尚篆、隶，朝廷的丰碑、贵族的墓志，莫不用篆用隶，以示庄严庄重。西晋官样隶书，既是蔡邕《熹平石经》那种官样隶书的变种，也杂有毛弘所传的梁鹄隶法，尽管工稳精细，却了无汉隶的气质，堕入程式化，徒有隶书体的华丽外表而已。东晋时，古体的主流地位已经开始动摇。一方面，本是专用古体书刻的墓志上出现了楷书；另一方面，“铭石”的隶书体势失去了整饬的派头，而且掺杂了楷法，刻工也很简直^⑧，这都是走向沦落的征兆。南朝碑志上，绝少隶书，更难见到篆书，以“八体六书”为象征的秦汉书写系统终于落下帷幕，以古体为主流的时代宣告结束。

但是古体并未泯灭，文献的记载显示，在盛行新书风的东晋南朝，宫殿题榜犹用古体，篆、隶书法犹有传人，东晋有能隶书的刘瓌，能篆书的韦昶。刘宋范晔以篆书名世，王僧虔是新体书家，也是通晓古文、篆书的学者，其子王彬也“习篆隶”。齐梁之际，杂体盛行一时，杂体多以古体为骨架，南士玩弄各种杂体时，“不依羲、献妙迹”，“留心字法”；又有“永明书学”重视“小学”的学风，篆隶书法稍有复兴，出现了习写“篆隶”的书家群。

在北方，古体的境遇则好得多，十六国时期、北朝前期的碑刻，北魏宫观的榜书，仍然采用篆书、隶书。即使在好尚南朝新书风的北魏晚期，鸟篆依然有人喜爱，东魏、北齐墓志盖上并不罕见。北齐时，隶书在邺都一带相当流行，大字隶书刻经在山东地区蔚为风尚。可见，衰落的古体书法仍然有它的用场，沿用未废。因为在书法家那里——即使是新体书家，“字学”是书法的基础这一观念根深蒂固，并没有因了新书体的风行而放弃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我们说古体的篆书、隶书由盛转衰是就这三百年间书法演变的大趋势而言。南北书风的差异很大，南方尚新，北方袭古，但是，北方盛行古法旧体之际，也有范阳卢氏传“锺法”于北方，而且北

朝后期出现了两次师法南朝新书风的高潮。

这一时期的南北书坛都有其包容的一面，南北书风的对比不仅是主流书风的对比，还有古体与今体两大流派的南北对比，且互见显隐，反映出当时书法传承、交流的复杂性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作为社会性的角色，“书家”受到人们的尊重，胜手如云；士族书家领导着书法潮流；开风气、立法度的大书家，都是“魏晋”时代的书家。

东汉时期以书法著名的士人尚少，到了魏晋，书家众多，成为一个艺术群体；著名书家莫不出自显赫的士族高门，而且多居高官显位。在南朝，寒门书家曾经崛起一时，其著名者多居“掌机要”的高位。书家“门第”或“政治化”的身份特征，有利于书法的广泛传播，尤其是新体书法的传扬，也促成了书家这一社会角色的确立。

南朝刘宋时代，虞龢对汉末到东晋的书法历史有过总结：“洎乎汉魏，钟张擅美，晋末二王称英”，这是南朝书家公认的“四贤”。他们为人称道的书体，主要是魏晋以来大行其道的草书、行书、楷书，则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新书风的代表人物。若以魏晋的时限来看，张芝显然未及曹魏时代，虞龢不囿于朝代而溯及张芝，正是从新书风自身的发展历程而论，避免了以政治史的段限为书法史断代。

从“钟张”到“二王”这一系，属于新体书法流派，是一脉相承的亲体与子体的关系。在虞龢的表述中，是以杰出的艺术家为坐标，居于“钟张”与“二王”之间的西晋以及东晋第一代书家被省略了。因为他们的书法是“钟张”的影子，即使有所变化，也不具备“二王”那样革新的面貌，其作用主要是传承而已。

曹魏、西晋书坛上传古文、篆书的流派，势力也很强大，最为著名的书门是河东卫氏，代表人物是卫觊、卫瓘。曹魏时，能篆书的书门还有京兆韦诞，与卫觊齐名。西晋之后，这一流派在北方颇有势力，清河崔氏、陈留江氏是北方具有影响力的书门，他们都是传卫氏书法。在南方，卫

门书法并未绝迹，且不说王导、王羲之兼师卫氏，南齐时，西晋卫恒的散隶书法还在流传。

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书学著作出现于魏晋南北朝，作者多是书法家。

秦汉时，文字学家往往就是书法家。魏晋以后，以新体书法著名的书家虽然注重字学，但大多不再是文字学者。许多书法家从事书学著述，书法家往往也是书论家、书法史家。如曹魏韦诞《奏题署》，东吴皇象《与友人论草书》，卫恒《四体书势》，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，王僧虔《书赋》《书论》，庾肩吾《书品》，陶弘景《与梁武帝论书启》，这些书学著作，与东汉书家崔瑗《草势》、蔡邕《篆势》之类的赋体文章大不一样^⑨，不再是泛泛描述书体形态、赞颂书法美感，而是叙述书法的流派，记载书家擅长的书体，评价书家的风格，鉴定作品的真伪等等；这些著作也记述书体，但远远超出了字学著作所称“八体六书”的范围，涉及当时所见的书写体势。可以说，我国独立意义上的书学著作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出现。

魏晋南北朝书家喜好精良的书写器具和材料，一些书家是制造笔墨纸张的高手。

文房四宝中，笔、墨、纸与书写行为最为密切，而且关联着书写者的即时感受、书写的效果。蔡邕自矜能书，“非流纨体素，不妄下笔”，魏晋南朝书家一直传为美谈。曹魏书家韦诞说：“夫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若用张芝笔、左伯纸及臣墨，兼此三具，又得臣手，然后可以建劲丈之势，方寸千言。”^⑩韦诞自制的墨，“一点如漆”；他还能制笔，所著《墨方》《笔方》记录了制造笔、墨的过程和方法。东晋韦昶善篆书，“又妙作笔，子敬得其笔，称为绝世”^⑪。南朝刘宋书家张永有巧思，“纸及墨皆自营造，上每得永表启，辄执玩咨嗟，自叹供御者不及也”^⑫，据说，张永自造的纸，“紧洁光丽，辉日夺目”。